

中国式现代化与阿拉伯国家现代化： 比较、互鉴与共进^{*}

刘术刚 余业佳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极具本国国情之鲜明特色，更具广泛深刻的世界意义。基于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异质性，中国式现代化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了诸多借鉴意义，双方通过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峰会等平台机制在政治自主、经济转型、文化认同、全球治理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阿拉伯国家需跳出传统的“中心—边缘”思维定式，探索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推动经济向多元化转型，让宗教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借助伊斯兰中间主义促进文明对话，用制度创新凝聚发展共同体的共识，并依托“一带一路”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拉伯世界各国均呈现着独属本国的国情、社情，在推进现代化征程中需要结合其自身情况作适应性、适时性调整。因而，阿拉伯世界并不是要照搬现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而是立足自身国情探索发展路径，关键是破除“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走出一条宗教与世俗和谐共存、传统与现代交融互促的本土化道路。

关 键 词：中国式现代化；阿拉伯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术刚，博士，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桂林 541006）；余业佳，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5 级硕士研究生（桂林 541006）。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5-0020-2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嵌入式发展研究”（22CMZ010）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①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其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这一核心力量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行进在正确轨道上。这条道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展现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特色。它既遵循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彻底跳出了西方现代化那种以资本为中心、导致两极分化、物质主义泛滥、对外掠夺扩张的老路。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战略抉择,对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现如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正携手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未来中阿的战略合作将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据愈发关键的地位。因此,系统地、更深层次地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文化认同、国家合作等维度审视中阿现代化进程的共性与差异,为阿拉伯世界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路径提供方案图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深入分析这些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回答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好”这个重大命题,也可以拓展中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

(一) 国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认知

中国式现代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其影响已经在全球领域中广泛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实践探索,更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经验,因此,廓清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不仅是国内备受关注的研究话题,也同时引起国外学者们的持续关切。国外学界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其全球意义正在持续显现。

从现代化发展范式方面来看,相较于西方式现代化,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不同于以资本为中心、往往导致贫富悬殊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重视经济增长与

^①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载《求是》2025年第1期,第4页。

社会平等的平衡^①,这种模式挑战了西方在现代化话语上的垄断地位,展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又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阿尔弗雷多·加西亚·希梅内斯等学者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并非通过剥削他国,而是依靠自身发展以实现现代化^②,这标志着其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单线现代化史观的创新超越,并开创了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阿尔及利亚学者萨利姆·侯赛因和热合麦尼·萨拉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新兴经济关键力量,具有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和平与软实力为路径、以超强经济硬实力为支撑、以推动多极化为目标的鲜明特征,其迅猛崛起正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家治理范式的成功引发西方担忧,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演进。^③ 上述观点反映出国外学者对全球权力结构变迁的敏锐洞察,也反映出非西方视角下对中国式现代化多元性和合法性的肯定。

从对发展中国家借鉴意义方面来看,毛里塔尼亚学者穆罕默德·萨阿迪·切克·尤巴在分析中非关系时认为,中国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务实渐进的改革策略,为非洲提供了不同于外部强加方案的全新发展思路^④。肯尼亚学者维维安·恩基罗泰·凯梅尼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彰显现代化路径多元性、以国家为主导、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个性化发展范式,中国模式为肯尼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使肯尼亚能够追求符合本国利益与现实的发展道路。^⑤ 阿布德·扎尔金通过分析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经济改革实践和发展战略路径,系统总结了中国发展的成功要素并阐释了其深远的借鉴价值,指出中国数十年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其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去了希望。^⑥ 这些观点说明阿拉伯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揭示出阿拉伯世界在现代化探索中对多元发展路径的现实需求。

① [英]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孙豫宁、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9 页。

② [古巴]阿尔弗雷多·加西亚·希梅内斯、楼宇:《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意义》,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51 页。

③ [阿尔及利亚]萨利姆·侯赛因、[阿尔及利亚]热合麦尼·萨拉:《中国作为经济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特征》(阿拉伯文),载《教授研究员法律与政治研究杂志》,2023 年第 7 卷,第 4 期,第 1064-1082 页。

④ Mohamed Saadi Cheick Youba, "An Analysis of the Value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African 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s in Sociology*, Vol. 5, No. 7, 2023, pp. 16-17.

⑤ Kaimenyi N V, Dengxue H, "Competing Paths to Development: The China Model in Kenya Through a Modernization Theory Len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9, No. 1, 2026, p. 9.

⑥ [阿尔及利亚]阿布德·扎尔金:《中国发展经验解读:成功秘诀与启示》(阿拉伯文),载《发展与研究杂志》2014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41-73 页。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方面来看,沙特学者穆罕默德·图尔基·苏戴里基于沙特主流媒体对中国全球战略、经济治理及政治实践的系统性分析可见,部分沙特精英阶层与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及其在全球格局中对美国霸权的制衡效应持赞赏态度,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则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复杂图景。^①法国的让努马·迪康热教授则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最震撼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条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②上述认识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③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④的重要论断形成深度契合。总体而言,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时代价值,也深刻认可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实践的世界意义。

诸多海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给予了肯定评价,但也有部分学者曲解甚至抹黑中国式现代化,有必要对这些谬误进行回击。一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复制品。^⑤美国学者斯科特·肯尼迪认为中国现代化模式可以归类于东亚发展主义国家模式。^⑥这种归类显然忽略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东亚发展主义国家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本质区别。同时这种归类本质上仍是用西方既有现代化理论来判定中国的实践,没有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形成的独特性。二是曲解中国的意识形态。蒂亚戈·纳赛尔·阿佩尔指出,中国现代化发展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逐步过渡,一旦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私人资本占有,其就会彻底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⑦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忽视了中国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① Mohammed Turki Al-Sudairi, “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Saudi Media,” *CRC Gulf Papers*, 2013, pp. 63–66.

② [法]让-努马·迪康热、彭姝玮:《基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维度对中国道路的思考》,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第65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④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⑤ 陈金明、胡周:《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误读及其应对》,载《海派经济学》2025年第2期,第235–248页。

⑥ [美]斯科特·肯尼迪、王雪:《“北京共识”的神话》,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4期,第1页。

⑦ Tiago Nasser Appel, “Just How Capitalist Is China?,”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1, No. 2, 2008, pp. 656–669.

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属性的刻意歪曲。三是将中国式现代化视为对西方现代化的否定与威胁。美国学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梦”的核心理念与影响力或将逐渐让位于“中国梦”,“西方中心主义”也可能被“中国中心主义”逐步取代。与此同时,“西方化”的趋势或许会被“东方化”所平衡甚至超越,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① 澳大利亚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马克·马必胜亦指出:“中国的崛起不仅代表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物质转型,更对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构成了直接挑战。”^②这些认知的局限性在于刻意放大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对抗性,误将中国追求自身发展的努力解读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和对其他国家发展空间的挤压,完全误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属性。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密码与世界意义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维度来说,国内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纵观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内外矛盾结构性交织的困境。从外部结构性压力来看,部分发展中国家深受不公正国际秩序的对待与霸权干涉。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质上是“中心—外围”的剥削结构。先发国家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诋毁目标国本土文化、灌输新自由主义等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阻挠后发国家崛起,并辅以政治打压和军事干预,使其难以实现经济赶超^③。更为隐蔽的是,世界经济结构从民族经济向跨国经济的转变,在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却削弱了其经济主权,使其在全球化中处于被动地位^④。从内部治理的主要矛盾来看,部分发展中国家呈现政治失序与发展战略异动样态。相较于中国长期保持政治稳定,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政局动荡、治理体系薄弱、国家能力不足等困境,这被普遍认为是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致命弱点。^⑤同时,发展理念也存在偏颇,诸如黎巴嫩、土耳其等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制度理念的弊端显现,并在矛盾积累后集中爆发^⑥。相较于非宗教发展中国家,伊斯兰世界还面临

①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2035: From the China Dream to the World Dream,” *Global Affairs*, Vol. 2, No. 3, p. 5.

② Mark Beeson and Fujian Li, “What Consensus? Geopolitics and Policy Paradigm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1, No. 1, 2015, p. 93.

③ 田文林:《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 年第 3 期,第 14-29 页。

④ 同上,第 2 页。

⑤ 宋学增:《比较视野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症结和启示》,载《科学社会主义》2024 年第 6 期,第 143 页。

⑥ 姜英梅:《“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中东经济发展问题:困境与应对》,载《当代世界》2021 年第 4 期,第 50 页。

许多独特挑战,如深厚的宗教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世俗化、理性化之间的张力,以及外部干预加剧的内部教权与政权矛盾等^①。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的解构,学者们从执政党特性、执政经验等多维度进行了深度阐释。一是中国的现代化成功之路关键是始终坚持政治独立自主与稳固政治领导核心相统一,中国在总结历史和实践的基础上得出政治独立是前提,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根本保障,正是这一制度优势确保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长期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其能够实施超越短期选举周期的长远规划^②。这种政治定力使中国能够顶住外部压力,打破“中心—外围”的依附性格局,这是实现全方位和平崛起的关键^③。二是执政理念上将以人民为中心与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相融合。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资本逻辑,将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作为核心目标,具体体现在精准扶贫、统筹区域发展与城乡发展等领域,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④一句话,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就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⑤。从发展理念演进角度来看,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实现了从片面追求工业化到“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并坚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⑥,也向世界表明中国始终从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致力于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追求各国合作共赢、和平安全、共同繁荣的价值目标。三是执政经验上达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方法论智慧,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市场决定性作用与制度优势,打破西方政企二元对立理论,形成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方案^⑦。这既避免了无序市场的弊端,也克服了政府低效的缺陷,成为一种关键的方法论智慧。四是战略导向层面依托举国体制制定实施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国家战略引领为国家治理指明方向。正是因为有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的组织、规划、统筹、动员,中国现代

① 张熙:《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进程影响初探》,载《中国穆斯林》2014年第2期,第40页。

② 朱兆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比较及启示》,载《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53页。

③ 王海霞、林颖:《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载《理论导刊》2025年第4期,第10页。

④ 王珏:《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贡献及对后发国家启示》,载《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第12-15页。

⑤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⑥ 钱乘旦、晏荣:《热话题与冷思考——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与经验教训》,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第10-11页。

⑦ 黄泰岩:《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理论创造》,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1期,第19页。

化才得以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①, 国家战略才能得以稳步推进。另一方面, 社会参与与实践反馈增强了国家战略的适应性与包容性。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引领, 需要一个强有力国家政权体系的推动, 尤其是需要不断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② 显然, 社会行动在国家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从多维度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系统性方案的全球意义与核心特质。它的成功并非单一领域的突破, 而是由稳固政治领导、人民至上价值、市场与政府协同治理及可持续战略布局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启示,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普遍面临的政治失序、外部干预、公平与效率失衡等困境时愈发清晰。它不仅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范式, 更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夯实自主发展底气、提供有益镜鉴。相较于过往研究注重单向输出的经验推广, 本文试图通过双向对话的范式研究, 基于系统性对比中阿现代化进程的差异, 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一个可选择、可反思的参照框架。

二、中阿迈向现代化征程的基础性差异分析

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征程, 就是一部人口大国在中央政权强有力主导下, 推进一系列极具本国特色的改革实践史, 更是一部发展中国家统合主权至上、经济先行、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于一体的治理创新史。系统分析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呈现高度多元化特征。作为深受宗教影响的民族国家, 其发展深受殖民历史遗产、地缘政治博弈及石油经济的综合影响, 核心挑战在于如何调和传统、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基于现有研究基础, 可以发现中阿现代化的基础性差异主要围绕领导权力核心、治理原则、文化内核、信仰根基等四个主要方面, 系统梳理这些差异, 可以从国家发展建设的底层逻辑出发, 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经验。

(一) 领导权力核心表现为统一和分化的差异

在领导权力核心上, 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现代制度体系国家。在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权力核心紧密协作, 共同形成了一种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领导权威。七十多年来, 在党的领导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保证了我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① 殷冬水:《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何以可能? ——以国家动员能力为分析中心》, 载《探索》2023 年第 5 期, 第 66 页。

② 同上。

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展现出显著政治优势。^①同时,中国呈现出历史传承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统一模式”,这一模式根植于深厚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是对古代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了新政治大一统。^②这种政治大一统,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奠定了深厚历史根基,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坚实文明支撑。阿拉伯世界由22个主权国家组成,政治体制多元,权力结构分散,即君主制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权力源于家族世袭与部落联盟,共和制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则常与军方力量紧密关联,且普遍面临教派、部落冲突等挑战,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分散的格局。

这种领导核心的结构性差异使得治理效能成为双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分野。一是中阿现代化过程中治理效能发展的关键挑战不同。中国的本质特征在于多元化、复杂化与非均衡化。这样的本质特征内嵌于人口众多与疆域广阔的形式要素之中,为国家治理带来了独特的结构特征与治理矛盾。^③但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经验表明,稳固且具有强大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的领导核心是实现超大规模社会有效治理、推动快速工业化的关键保障。而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探索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多元化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凝聚发展共识,提升国家能力,并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例如,君主制国家往往凭借传统权威和宗教纽带维持社会稳定;共和制国家则更强调民众参与和权力制衡,却常面临党派纷争导致的决策效率问题。两种发展模式各有其国家特色,关键在于找到适配自身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的发展路径。二是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窗口。从君主制国家现代化发展来看,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政教合一的国家,曾因严苛的宗教限制显得保守。但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实现经济转型与社会改革,沙特推出了“2030愿景”经济改革计划。^④不过,沙特的现代化仍是在君主制框架下,通过强化王权来推进的。如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重组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削弱宗教警察权力等,都是为了集中权力,打破传统治理的碎片化。这种王权主导的现代化路径,和中国基于党领导、广泛政治参与、制度化协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模式有着本质区别。从共和制国家现代化发展来看,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共和国,

①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4年9月14日,第2版。

② 汪仕凯:《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88页。

③ 张爱艾:《从大国治理的特征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性》,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182-189页。

④ 陈沫:《沙特阿拉伯“新政”与中沙合作前景》,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8期,第58页。

其现代化历程集中体现了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典型特征。埃及实行总统个人集权的共和制,以宪法赋予总统至高行政、军事、立法大权,其领导核心以总统个人为权力中心,军方力量在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埃及政党的作用微弱,权力运行主要受个人势力与军方影响。埃及所奉行的这种领导方式,与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央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领导方式有着本质区别。

阿拉伯国家政治体制的多样性,源于其历史、地缘和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君主制、共和制等形态均是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中国在自身发展中体会到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才是好制度。同样,阿拉伯国家也在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二) 治理原则表现为民主法治与宗教法治的差异

在现代化道路发展过程中,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均面临传统与现代化相协调的时代课题,双方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制度差异与政策差异,深刻反映了各自治理理念与发展路径的本质区别。而一切治理的起点均以法律为基础,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是落实上层建筑意志的关键保障,而中阿在法律层面的不同之处主要呈现出现代法律与宗教律法的差异,中国的法治体系适应了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律法体系则与其中东地缘政治、宗教经济、传统社会结构相适应。

中国的法治体系与阿拉伯国家的宗教律法体系,均是各自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处于不同国情之中。中国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阿拉伯国家则在宗教传统框架下探索现代治理,两者不存在高下之分,而是各有其合理性与适配性。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不断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增强法律规范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协调性,^①形成了法律覆盖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现代化治理模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根源,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 反观阿拉伯国家的法律传统深植于伊斯兰法系,宗教经典是其法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传统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与各国现代化进程不断调适,形成了宗教律法与世俗治理相融合的多元实践。尽管阿拉伯世界现代司法体系广泛结合了世俗法律,但伊斯兰法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家庭法和继承法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处理外籍移民涉及的家庭、

① 新华社评论员:《弘扬宪法精神,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载《新华每日电讯》2025 年第 2 版。

② 喻中:《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文化根源》,载《法律和经济科学》第 2025 年第 1 期,第 1 页。

婚姻、劳务以及财产继承等争议时,两种法律体系往往需协同适用。^①

但阿拉伯世界并非同质整体,其在处理宗教与法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存在显著内部分化。依据政教关系与法律体系的现代性程度,阿拉伯国家可大致分为传统教法主导型、世俗宗教混合型、世俗型三种类型,这决定了它们对中国法治主导经验的参照存在不同维度。一是传统教法主导型国家,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其治理体系明确以沙里亚为最高宪法,宗教权威直接规训社会秩序与个人行为。这类国家治理导向的核心挑战是在不触动宗教法统根本地位的前提下,实现治理的有序化与专业化以满足现代经济需求。如沙特在“2030 愿景”下颁布《个人地位法》、设立专业商事法院,旨在将传统教法原则程序化,以增强法律的可实施性。这类国家对中国治理导向经验的参照主要聚焦于法律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有益价值,而非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理念本身。二是世俗宗教混合型国家,以埃及、约旦、摩洛哥等多数阿拉伯国家为代表。此类国家通常拥有世俗宪法并建立形式上的现代司法体系,但宪法中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伊斯兰法是立法的主要来源之一。治理的复杂性体现在国家决策需在世俗政府、军方与宗教间不断权衡。这类国家对中国治理导向的经验主要在于如何通过渐进式的法治建设与有效治理来维持转型期的社会长期稳定,以及国家在推动社会改革中展现的强大执行力。三是世俗型国家,以突尼斯为代表,其 2014 年通过宪法明确国家性质为公民国家,在法律和政治层面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虽然伊斯兰文化影响深远但宗教律法不再直接作为立法渊源,其现代化征程面临的挑战与传统发展中国家基本无异。不过,这种世俗化的宪法始终建立在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外壳之上,并未彻底完成国家与宗教的身份切割,突尼斯 2022 年宪法规定国家有义务践行纯正伊斯兰的价值目标,形成一套全新的“国家—宗教”关系模式。这揭示了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转型中的“世俗化”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而是一种以现代宪法为框架、又将传统宗教价值纳入国家建构中的宗教律法体系。

(三) 文化内核表现为集体主义家国认同与复杂、多重认同差异

世界上的文明具有多样性,自古至今皆然。中阿文化内核的核心差异根植于历史传统与认同实践逻辑。中国依托大一统历史根基与农耕文明孕育的集体主义,建构起“家国一体”的认同体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将爱国主义教育与现代建设相融合,形成超越单一民族的国家共同体认同。阿拉伯世界则呈现多重认同特点,其中又以宗教义务与民族复兴双向并行形成双重认同支撑体系为主流,这种差异源于文化传统,也塑造了不同的社会凝聚方式与发展动力。因此,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内核亦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其差异

^① 韩小锋:《阿拉伯国家司法体系分析》,载《中国投资(中英文)》2025 年第 1 期,第 57 页。

性亦随之凸显。

在文明发展的历史根源上,中国有其他国家少有的大一统历史传统,秦汉之际,建立起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的国家,并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国家制度,正式形成了“大一统”思想。^①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促进了不同层级生活共同体的形成,最终建构起以“家国一体”为表征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②阿拉伯世界则依托伊斯兰教“乌玛”(穆斯林共同体)观念、阿拉伯语的统一及帝国扩张,逐步形成宗教与民族相交融的认同体系。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路径,通过强化文化主体性、意识形态领导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应对挑战。阿拉伯世界则面临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深层张力,探索兼顾认同与发展的道路仍处困境。“阿拉伯之春”的后续动荡深刻反映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间的激烈碰撞,这再次印证了阿拉伯世界探索一条既能保持传统又能实现良性发展的路径仍处于进行时。在国民核心身份定位上,中国在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中,明确将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置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并强调“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③,这实质上是将“家国一体”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公民的法定义务与自觉行动。阿拉伯世界则无绝对唯一的身份锚点,而是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交织,这两种核心力量既存在博弈,又在共同目标下形成合力,通过持续互动共同塑造着阿拉伯世界的身份认同。

上述中阿文化内核的宏观差异,揭示了双方在凝聚社会共识、塑造国民身份上的不同路径。然而,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认同结构远非宗教与民族双重认同这一概括所能完全涵盖,其内部存在着基于历史、教派、地缘政治而形成的复杂认同。^④一是宗教认同主导型国家,沙特其文化认同的核心是超越民族与国界的伊斯兰教“乌玛”观念。^⑤国家合法性与社会凝聚力高度依赖于对伊斯兰法的捍卫与对宗教传统的维护,这类国家面临的现代化挑战,核心在于如何在不削弱宗教权威的前提下,将传统的宗教共同体情感转化为支持国家发展、科技创新与社会改革的现代公民意识。二是泛阿拉伯民族认同影响深远型国家,以埃及、叙利

① 肖铖、王少明:《论“大一统”政治实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历史价值》,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第157页。

② 刘仁健:《家国一体:乡村集体主义传统及其现代运用——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鲁中淄东太河水库建设为例》,载《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22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中国人大网,2023年10月24日,<http://www.npc.gov.cn>,上网时间:2026年1月15日。

④ 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3期,第9-16页。

⑤ 陆培勇:《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的文本学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3期,第76-85页。

亚、伊拉克等为代表。这些国家历史上深受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其文化认同中阿拉伯民族属性与伊斯兰教信仰紧密交织,但民族统一的政治理想时常超越单一国家的边界。其挑战在于如何调和超国家的阿拉伯民族情怀与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并处理国内复杂的教派、族群分歧。三是国家认同强化型国家,以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以及“阿拉伯之春”后部分北非国家为代表。这类国家或有意识地通过塑造独特的国家品牌,如迪拜的全球城市形象、发展绩效和福利制度来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或在经历动荡后,将重建秩序与稳定的希望寄托于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其文化认同更侧重于基于公民身份、国家成就和地域特色的现代国家认同。

(四) 信仰根基表现为理论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差异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在信仰根基与文化传统方面存在差异,前者以科学信仰为主体,后者则以宗教信仰为基石。中阿信仰形态虽属不同谱系,但都是维系社会凝聚、提供精神支撑的重要力量。双方现代化互鉴不必拘泥于信仰形态差异,而应立足各自国情,充分激活信仰的精神引领力,这同时也使得双方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各具特色的挑战与路径选择。显而易见,国家的发展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模式,而是基于本国国情制定相应的科学的发展策略。

中阿信仰差异源于生成逻辑不同。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实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和党员信仰的理论根基;阿拉伯国家则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精神传统,其信仰源于真主启示与《古兰经》教义,强调对超验价值的敬畏与遵从,宗教经典在道德与法律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两种信仰体系分属不同谱系,前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根基,后者以启示宗教为精神纽带。两者都有其特殊性,但都是各自社会凝聚共识、提供精神支撑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种宏观差异在实践中并非一成不变。面对发展的压力,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基于自身国情,对神圣启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与应用,从而探索出不同的发展动力转化路径。一是君主制国家的代表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是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守护者,依托“2030 愿景”推进务实转型。在坚守伊斯兰信仰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开放寻找宗教法理上的合理解释。诸如推动女性驾车和工作,这不仅是为了经济,也符合伊斯兰法且有利于社会利益的原则。二是共和制国家的代表突尼斯。突尼斯于 2014 年完成宪法修订,尝试在法律上确立公民国家原则,将国家公共政策框定在宪法秩序内。虽然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是其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其政策必须符合宪法而非教法。突尼斯即使信仰根基属于宗教信仰,但其改变也恰恰表明在宪政框架和现实发展压力下,宗教因素可以被有效地纳入世俗国家的治理轨道,从而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稳定的制度环

境,这也使突尼斯的挑战更接近于经典的后发民主国家发展问题。总的来说,中阿虽在信仰形态上分属不同谱系,但二者同为维系社会人心、凝聚国家共识的精神根基。双方现代化互鉴不必拘泥于信仰形态差异,而应立足各自民情民意,充分激活信仰的精神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凝聚力。

三、中阿迈向现代化过程的双向互动关系

多项调查表明,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2023 年 7 月,迪拜咨询公司 ASDA'A BCW 对 18 个阿拉伯国家的 3,600 名青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他们国家的“盟友”^①,这表明阿拉伯国家的青年日益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友好、寻求全球共同发展的国家。根据 2022 年 7 月“阿拉伯晴雨表”调查报告,受访者中摩洛哥(64%)、毛里塔尼亚(63%)、苏丹(60%)、伊拉克(54%)、黎巴嫩(51%)、约旦(51%)和突尼斯(50%)对中国好感度均超过 50%。^②这也深刻反映了中阿关系在政治对话、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多维度互动中日益密切,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文明传承与复兴视域下发展理念的深层共鸣

中阿发展理念有着深刻的共鸣。一是双方在文明复兴与独立发展的道路选择上产生共鸣。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立足自身国情、兼容并蓄的发展模式,与阿拉伯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的发展道路之努力,形成了跨越文明的对话。随着“东升西降”趋势日渐增强,阿拉伯世界日益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这一认知最直接的体现,是沙特、阿联酋等国推出的国家级转型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对接。沙特的“2030 愿景”明确以减少石油依赖、推动经济社会多元化为核心使命,其内在逻辑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结构升级的经验高度契合。二是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将双方紧密相通。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021 年,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激励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减贫方案,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③阿拉伯世界主动将改革融入本国议程。沙特推行伊斯兰教温和化改革,2018 年取消女性驾车禁

① 严瑜:《阿拉伯青年:中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 年 7 月 11 日,第 10 版。

② Michael Robbins, “Public Views of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n MENA,” *Arab Barometer*, July 2022, https://www.arab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ABVII_US-China_Report-EN, 上网时间:2026 年 3 月 11 日。

③ 尹婧、车效梅:《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20 页。

令并赋予女性政治权利,作为“2030 愿景”的一部分,旨在释放女性劳动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并探索与本土宗教文化结合。三是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共同价值。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治理议程之中。并且中国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与能源结构低碳优化,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规则制定与合作机制构建。^① 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积极推动生态治理,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中阿双方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投资、生态保护技术共享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② 四是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演进。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推进全球治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与多边主义,依托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共同应对全球挑战。阿拉伯世界秉持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原则,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发展优先、文明包容,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并重视巴勒斯坦问题。中国积极助力中东和解,推动沙特与伊朗复交,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为中东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二）世界格局演变进程中发展战略的系统链接

中阿发展战略的链接体现为系统性、机制化的协同。一是宏观上体现为国家长远愿景与顶层规划的同频共振。中国的“两步走”战略、“十五五”规划与高质量发展实践,同沙特“2030 愿景”、阿联酋“2071 百年计划”、埃及“2030 愿景”等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呼应。诸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 愿景”达成政策对接与项目落地,两者的战略对接以能源转型,如建立全球最大的阿尔舒巴赫光伏电站、基础设施如未来新城、吉达体育场和新兴产业合作为支柱,推动沙特非石油经济占比显著提升,双边贸易额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中观上表现为现代化战略体系的深度互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核心战略与阿拉伯国家推进工业化、经济多元化、知识型社会建设的愿景高度契合。双方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持续推动战略对接与路径融合,其具体成果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24—2026 年行动执行计划》中得到集中呈现,强调将教育合作和青年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多方位的合作和交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教育合作等。^③ 三是微观上呈现为治理模式与执政经验的机制化互鉴。近年来,中阿在治理经验互鉴已成为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峰会等机制下的重要议题。在政治治理领域,中阿通过政党交

① 马晓美:《阿拉伯国家绿色生态治理与中阿合作》,载《中国穆斯林》2025 年第 3 期,第 81 页。

② 尹婧、车效梅:《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响》,第 3—29 页。

③ 黄慧、姬鲁冰:《社会系统论视角下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 年第 5 期,第 9 页。

往渠道深化现代化建设经验交流互鉴,是推动现代化进程持续前行的重要路径。中阿政党对话会这一机制化平台,对中阿双方交流现代化建设理念、探索现代化建设路径具有独特价值。^① 在社会治理领域,中方分享自身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层治理等方面的经验,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阿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诸如在医疗援助上,中国已向阿尔及利亚、吉布提、科摩罗、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也门、科威特等 9 个阿拉伯成员国派出了医疗援助队。^②

(三)科技产业变革浪潮下关键领域的务实共进

面对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中阿顺应时代趋势,推动务实合作迈向新台阶。一是经济与基建合作持续深化。中阿立足传统能源、贸易与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交通、能源、通信等互联互通项目落地,夯实产业合作根基,为科技变革与产业升级提供稳定支撑。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中东从石油经济向多元化转型,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③ 如阿联酋艾尔达芙拉光伏电站,是由中国公司承建,2023 年 6 月投入商业运行,是目前已建成的世界最大单体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满足 20 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二是新兴领域合作动能持续增强。双方紧跟全球科技产业变革趋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清洁能源、航天航空、现代农业等新兴领域加强协同,共建联合实验室与技术平台,创新驱动发展动能不断释放。中阿在通信卫星、遥感卫星、深空探测、卫星导航等领域广泛合作,聚焦卫星技术转移、商业航天等方向,通过政策对接、技术援助及联合研发,助力“天基丝绸之路”落地与中阿命运共同体共建。^④ 诸如,阿曼兰斯航天公司与中国企业地卫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合作成功发射阿曼首颗人造卫星,标志着阿曼正式迈入太空时代。^⑤ 三是全球与地区事务高效沟通。中阿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科技伦理与区域稳定等议题上保持密切协作,共同推动国际规则更加公平合理。中阿共同推进八大共同行动,其中粮食安全共同行动,中方同阿方商定共建 5 个现代农业联合实验室,开展 50 个农业技术合作示范项目,向阿方派遣 500 名农业技术专家,帮助阿方增加

① 本刊编辑部:《在文明交流共进中构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侧记》,载《当代世界》2023 年第 8 期,第 60 页。

② 苏鹏丽、徐鹏、李鲲鹏等:《深化中国—阿拉伯国家中医药合作,共筑健康新丝路》,载《亚太传统医药》2024 年第 8 期,第 2 页。

③ 赵雅婧、王有鑫:《“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的经济合作》,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31-43 页。

④ 钮松、李雪妍:《新时代中阿外空领域合作及其对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1 页。

⑤ [阿曼]马吉德·阿尔·马塔尼:《期待阿中航天合作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中阿合作论坛,2025 年 10 月 11 日, http://www.chinaarabcf.org/zagx/rwjl/202510/t20251011_11730555.htm,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26 日。

粮食产量、提高收储减损能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①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与阿拉伯国家的转型发展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中阿关系已超越传统的能源与经贸合作迈向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四、适用于阿拉伯世界推进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②。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传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探索出来的。诚然,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无序发展、无章摸索,而是在不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础上的创造性实践。因此,阿拉伯世界作为非同质化整体,其内部各国在政治体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各国应当结合本国实际精准对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可借鉴元素,在学习发展中作适应性、适时性调整,避免盲目照搬、简单套用。

(一) 海湾君主制国家：以战略落地赋能经济转型,以风险防控提升社会韧性

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其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命题是在确保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从单一石油经济向多元化经济的转型。中国经验对其最具参照价值的,并非要求其改变政治体制,而是提供围绕领导核心力量,通过制定科学系统的战略规划、强化规划落地执行,驱动大规模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经验。历史地看,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多为世俗化与教义的矛盾、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新冠疫情后给经济带来的冲击。^③ 因此,这类国家可以根据其自身国家体制、发展现状、发展困境有选择地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经验。

一是落实宏观顶层设计,推动政府职能精准转型。当前,沙特的“2030 愿景”与阿联酋的“我们阿联酋 2031”长期发展规划已初步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两国依然存在跨部门协调效率低、阶段性目标达成率低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现代化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的宏观战略设计,更需要强有力的规划执行能力,要

①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载《中国人才》2023 年第 1 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2022 年第 1 版。

③ 李伟、张立伟:《沙特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2030 愿景”为例》,载《阿拉伯研究论丛》2023 年第 1 期,第 74-90 页。

明确政府不仅是社会的监督、监管者,更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之间加强协同配合,提升政策执行效能。中国通过建立统筹全局的协调工作机制,确保中长期发展规划分解为各阶段可落地的具体任务,推动各部门形成政策合力,这些做法有助于为海湾君主制国家在长期规划落地过程中化解协同难题提供参考。

二是构建风险应对体系,增强外部冲击抵御能力。尽管海湾国家依靠丰富的能源资源换取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敏感的能源价格波动易引发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出口收益也易加剧国内资源分配失衡、贫富分化等结构性矛盾,这些因素的叠加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美、俄等大国长期介入中东事务,使该地区成为域外大国争夺焦点,加剧了地区地缘政治博弈,阻碍了各国经济发展。^①为此,沙、阿两国可建立系统性风险应对机制,在依托能源收益推动转型的过程中,提前搭建风险预警与应对框架,均衡分配发展收益与夯实转型的社会基础,进而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

三是深化经济特区建设,助力经济多元化转型。沙特“2030 愿景”“我们阿联酋 2031”愿景均明确将经济特区与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核心抓手,其核心目标是摆脱单一能源经济的依赖,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为此,可参照中国渐进式改革思路,摒弃既定不变的固定规划与路线,优先落实既定任务、解决当下突出问题,优先推进形成广泛共识的改革举措,逐步形成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的发展效应。^②沙、阿两国可先依托已有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推动局部优势产业增长,再通过政策引导逐步扩大开放辐射范围,有序带动周边及全国产业升级。

四是推动宗教与现代化的协同道路。海湾君主制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需重点关注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在坚守伊斯兰教积极精神内核的前提下,推动宗教适应时代发展的调整与改革,依托宗教自身的自我调节特性,探索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道路^③。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对其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如沙特的宗教改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法教义改革,它以“去极端化”为内核,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强调发挥教育、发展、公正和法治在根除极端主义上的作用,以实现伊斯兰教的温和化和

① 杨竞凯:《数字“一带一路”框架下阿联酋非石油经济的发展》,载《中国商论》2022 年第 15 期,第 55-57 页。

② 苏阳、罗丹:《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载《社科纵横》2019 年第 5 期,第 24-27 页。

③ 张熙:《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进程影响初探》,载《中国穆斯林》2014 年第 2 期,第 40 页。

现代性。^①

（二）北非共和制国家：以工业化赋能发展，以民生保障凝聚共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北非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存在复杂而突出的经济不平等問題，以埃及、突尼斯为代表的北非共和制国家，主要表现为企业发展机会不均、就业分配失衡、劳资收益分配不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等多重矛盾交错叠加，此类结构性矛盾曾被 21 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增长态势所掩盖，导致经济增长红利未能有效普惠广大民众，社会贫富分化与发展失衡问题持续凸显。^②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自主的发展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步入发展快车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建国家共享发展成果，在工业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等层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为渴望独立发展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了经验参考。^③

一是锚定园区建设抓手，推进工业化先行先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是通过设立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政策载体开展先行先试，在特定区域集中配置资源、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快速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与示范引领效应。事实上，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成功实践已证明中国经验的可行性。因此北非共和制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等关键区位打造产业链集群并提供政务服务，将产业园区升级为制度创新高地。

二是聚焦重点群体，扩容本土就业吸纳空间。埃及“2030 愿景”明确指出，埃及女性就业渠道狭窄，文盲率居高，可享有的社会服务少于男性；同时，其青年群体所学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造成失业率偏高；^④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和以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与社会服务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两大经验，具有直接参照价值。埃及等北非国家可重点培育轻工类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财税优惠、金融扶持、招商引资等政策工具，依托开罗、亚历山大、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布局项目落地，积极引入中国企业等外部资本投资设厂，开发适配青年、女性群体的低门槛就业岗位，持续拓宽本土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结构。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系统性降低外资投资风险。当前，突尼斯对外引资仍面

① Prince Faisal bin Farhan, “A Culture of Peace,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at the Heart of Fighting Terrorism,” *Statement at the United Nations*, June 28, 2021, <https://undocs.org>, 上网时间：2026 年 8 月 14 日。

② 白若萌、王三义：《北非阿拉伯国家经济不平等问题探析——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例》，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4 年第 10 期，第 43-59 页。

③ 贾悦琪：《突尼斯：“向东看”趋势下与中国的新型伙伴关系》，载《中国投资（中英文）》2024 年第 9 期，第 50-52 页。

④ “Egypt, Egypt’s Vision 2030,” *Official Report of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6, p. 73.

临安全局势复杂、法律法规体系繁杂、行政审批效率偏低等多重约束,加之 2015 年恐怖袭击事件后国内安全环境长期未能完全修复,进一步抬高了外资准入及运营的制度成本和安全成本。^① 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健全法治体系、精简行政审批流程、完善全域社会安全治理、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持续塑造可预期、可持续的营商生态,从制度层面有效化解经营风险与安全隐患。突尼斯可立足本国国情合理借鉴这一治理逻辑,从法律制度完善、行政效能改革、社会安全治理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持续优化营商制度供给、稳定市场预期,系统性降低外资准入、落地经营与长期发展的综合风险,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与承载力。

四是借鉴多元减贫范式,精准推进民生治理提质。突尼斯《2026—2030 国家发展规划》以社会公平为导向,聚焦消贫减困与乡村发展,通过完善乡村基建、扶持农业弱势群体和拓展乡村就业进而推动区域均衡发展。中国长期探索形成的分阶段、多模态复合型贫困治理模式,可为突尼斯社会改革与乡村减贫提供重要借鉴。新中国自 1949 年成立以来,国内扶贫历经了变革期、开发期、攻坚期、精准期和振兴期五个阶段,采用了救济式、变革式、开发式、攻坚式、精准式、振兴式等多模态复合扶贫模式,累计使近 8 亿贫困人口于 2020 年全部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② 在此基础上,中阿双方可共建减贫合作示范项目,依托中国专家智库与突尼斯地方政府协同联动,选取典型乡村试点,将中国减贫技术、治理机制与阿拉伯本土社会文化特质有机融合,探索适配北非乡村实际的可持续减贫路径。

（三）伊拉克等战后复苏国家：以发展重建凝聚共识,以权威重塑破解困局

对于伊拉克、黎巴嫩等深受教派冲突、战争创伤和政治僵局困扰的国家而言,其推进现代化的前提在于重振国家权威和凝聚社会共识。参照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战后重建与社会治理经验,一方面是以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为政治和解、国家重建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对话空间;另一方面是以价值共识凝聚为支撑,夯实民生发展根基,化解社会分歧。从国际体系视角看,伊拉克等遭受战乱滋扰的国家,在重建过程中不仅要平衡域外大国的关系,更取决于自身力量的增强。^③ 伊拉克重建期间,美国所主导的伊拉克政权建构、军事安全、经济恢复等方面的战后重建,实际上与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这是伊拉克重建长期陷入混乱和动荡的根源所在。^④ 因此,伊拉克等战乱国家的现代化

① 贾悦琪:《突尼斯:“向东看”趋势下与中国的新型伙伴关系》,载《中国投资(中英文)》2024 年第 9 期,第 50—52 页。

② 唐青叶:《贫困治理》,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 11 月,第 19—20 页。

③ 王丽影、王林聪:《伊拉克国家重建困境的根源及出路》,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3 期,第 111 页。

④ 同上,第 107 页。

进程相较于其他国家,需要作出更多探索。

首先,强化经贸合作主导,夯实国家重建物质基础。一方面是坚持多边外交自主,不断扩大“朋友圈”。随着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全球性挑战频发,全球治理面临总体性困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① 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所践行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即积极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拓展伙伴关系网络,为优化自身现代化进程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国际话语自主权。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取决于国家实力、国际道义、国际传播(话语叙述)。若一国的国家实力较强,能够遵循国际道义,并且有较强的国际传播效能,则能够提升该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反之,往往会削弱自身的国际话语权。^② 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家应准确把握自身国情定位与发展阶段特征,以符合本国实际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国家话语自主权。

其次,缓和政治派别矛盾,破解教派对立与政治分裂困局。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为伊拉克带来民主政治规则,由选举和责任政府等形式组成。然而,伊拉克人难以适应规则变化,规则也无法解决其国内原有矛盾冲突。多年发展显示,伊拉克民主实践未消除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间分歧,未带来民族团结与稳定,反而凸显彼此矛盾对立。^③ 因此,矛盾重重的国家建设核心在于以发展重新凝聚不同群体的共识,依托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消解派别对立。一是要锚定经济民生为核心抓手。通过基础设施重建、能源产业有序开发、民生保障体系搭建解决战后民众最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让不同教派、不同地域的民众都能从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逐步建立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共同认同,弱化基于派系身份的对立分歧。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伊拉克重建规划的对接,以中国电建、上海电气为代表的企业深度参与了伊拉克的重建。二是发展资源要公平分配。国家发展政策要面向全体民众公平分配资源、保障权益,避免因资源分配不公加剧派系隔阂。为打破基建差异加剧地域和派别差异的局面,伊拉克中央政府主导“1000 所示范学校”计划,交由履约能力强的中国企业承建。这 1,000 所学校均匀分布在全国 10 个省份,覆盖不同派别区域。这表明,伊拉克儿童不

① 李春福:《“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式多边主义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 年第 2 期,第 69 页。

② 赵磊:《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挑战与应对》,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 年第 5 期,第 76-77 页。

③ 李伟建:《伊拉克教派冲突背后的宗教文化博弈及对地区形势影响》,载《西亚非洲》2008 年第 3 期,第 44-48 页。

论信仰和身处何地,都能在配备电子化教学屏幕的现代化教室学习,^①这表明伊拉克国家正致力于推动发展资源的公平分配。因此,伊拉克可借鉴中国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以民生为本,在发展中调和社会矛盾、凝聚全民共识的治理经验,值得战乱国家借鉴。

最后,凝聚国家认同,夯实统一稳定的精神根基。构建超越教派、族群认同的国家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伊拉克重建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教派撕裂、族群割裂与长期战乱,不断消解民众的共同体意识,致使社会碎片化问题根深蒂固^②。中国立足本土历史文明与共同价值塑造全民共识,以统一的文化根基、共同的发展愿景强化集体归属感,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精神支撑。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可借鉴这一经验,跳出教派、宗族与派系的狭隘视角,挖掘本国共有历史文化资源。同时,塑造超越宗教派别与地域差异的统一国家叙事,进而增进民众国家归属感与民族凝聚力,从思想层面消解分裂隐患,为摆脱治理僵局、稳步推进现代化进程凝聚持久的精神力量。

(四) 阿拉伯世界: 构筑超越国家属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促全球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全人类的整体进步与共同命运,其价值导向与伊斯兰文化中强调的集体福祉和公正的观念是相吻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意味着世界所有国家实行同一种制度,也不是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的全球治理方案。这一理念为阿拉伯世界应对当前地区面临的和平与发展挑战提供了思想资源。

第一,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逻辑。阿拉伯世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逻辑就是要从阿拉伯民族到人类海洋。一是树立以共同利益为核心、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观。人类通过国际交往成为愈发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越来越成为国际交往得以顺利展开的必然要求。^③ 现代西方国家建构了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其本质是资本霸权控制下的国际政治格局。显然,这一模式违背了人类的公共利益诉求。^④ 因此,当各利益主体在协调中协同发展时,每个国家均担任国际秩序的调解者,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逻辑是相吻合。二是倡导尊重多元的文明对话观。全球化给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震撼,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球上的各种文明相遇、对峙或者融合。在这种场

① 管克江:《中国学校让伊拉克基础教育实现质的飞跃》,人民网,2025 年 9 月 25 日, <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5/0925/c1002-40572074.html>, 上网时间:2026 年 5 月 4 日。

② 王丽影、王林聪:《伊拉克国家重建困境的根源及出路》,第 99-119 页。

③ 陈永杰、迟荟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范式革新》,载《理论探索》2026 年第 2 期,第 52 页。

④ 同上,第 53 页。

域下,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必然的、必要的。^①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言道:“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②阿拉伯世界应充分利用媒体宣传自身的文明成就,同时积极汲取其他文明的精华,以促进自身的持续发展。三是塑造面向未来的共同责任观。将目光从历史恩怨与地缘争夺,转向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沙漠化、流行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这要求阿拉伯世界以整体视角,共同承担起对本地区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单一的制度性架构,而是兼具价值理念、合作框架、实践路径的综合体系。一是构建政治互信保障体系,国家之间建立政治互信有利于避免冲突,为维和平创造了有利条件。阿拉伯世界能通过区域间政治互信的建立,逐步迈向国际舞台。区域内国家若构建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可以避免域外大国的介入,防止事态变得复杂、矛盾加剧。二是构建共同安全保障体系,一个国家的安全绝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也不能为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而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阿拉伯世界应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推动建立阿拉伯集体安全对话机制,在反恐、网络安全、海上护航、难民问题等领域开展实质性联合行动。将安全与发展挂钩,以共同发展消解不安全土壤。三是构建经济融合保障体系,阿拉伯世界要以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增进产业协同为突破,加速推进阿拉伯共同市场建设,统一标准、减少壁垒,共同规划建设跨区域能源互联网、物流通道和数字丝绸之路,设立面向绿色转型和青年创业的“阿拉伯共同发展基金”,让一体化成果惠及所有阶层。四是构建人文交流保障体系,国家之间要依托青年、教育、科技、旅游四大桥梁,进一步团结合作、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不断促进人文交流与和谐相通。

第三,探索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阿拉伯路径。阿拉伯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被动接受制定好的蓝图,而是主动引领、从自身及周边做起的创造性过程。一是依托区域性发展联盟,发展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可再生能源、基建重建等特色产业,不断汇集各国先进技术,以实实在在的科技赋能产业成果推动区域共同发展。二是以“一带一路”为关键接口,将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更深入对接。这不仅是经济合作,更是发展理念、规划标准和治理经验的深度协同。三是发挥“斡旋外交”特色,依托其独特的地缘位置与宗教文化影响力,加快探索以集体协商的方式发出和平倡议,寻找符合地区实际的解决方案。四是以“青年赋能”为长久根基,谱写青年合作新篇章。阿方应

^① 尹江铖:《关于“各文明对话”的一点思考》,载《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1年第9期,第45页。

^② [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46-156页。

鼓励青年在科技研发、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开展联合攻关,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青年创新项目落地,让青年群体在实践中深化对彼此发展道路的理解,同时,助力他们成长为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现代化建设中坚力量,为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发展注入可持续的青春动能。

五、结语

2024 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实为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全新节点,聚焦当下,中阿必须在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协同合作。在这一征程中,当前中国走在了前面,本文意在通过系统比较中阿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差异,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对阿拉伯国家的启示与可行路径。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困境,与其政治格局多元化、宗教律法对治理的深远影响、宗教与民族认同交织的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必须明确,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探索,既不能简单复制西方模式,也不应生硬移植中国经验,而需立足本土国情,创造性转化各方智慧。这一探索过程的核心方向包括:政治上夯实自主根基,通过区域协作平衡“单元能力”与“体系权力”;经济上推动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文化上构建既固守本土文明根基、又能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的开放体系,主动参与文明互鉴;最终通过制度创新,超越宗教与教派分歧,构建民族共同体,并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并非提供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而是以成功实践证明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切实可行的。它为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关键方法论,即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保持战略自主性,发挥国家治理的能动作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融合。这为深化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南。未来中阿合作应继续向新而行,共同探索属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更加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新图景。

(责任编辑:章 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